

## 偉大的國際主義者

### 一、致力國際保障人權活動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在鎮壓各國人民反抗時總是互相勾結，因此，各國人民反抗壓迫、爭取解放的鬥爭是統一的，應該互相支援。列寧為此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

宋慶齡從自己的革命實踐中，深深體會到這個原則是完全正確的，並身體力行，加以運用。她對美國有著特殊的感情，但在她的心目中，始終有兩個美國：一個是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的美國，一個是與中國人民友好的美國人民的美國。

在大革命時期，宋慶齡親眼看到美國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來華，並參與帝國主義列強鎮壓中國革命和支持蔣介石政變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同時，美國人民也曾在國內掀起反對干涉中國革命的運動。

現在的歷史又在重演。美帝國主義不僅縱容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還支持國民黨政府鎮壓

中國革命。一九三四年，蔣介石的軍隊向南方蘇區狂轟濫炸。進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時，國民黨飛機的四分之三是美國提供的，用於「剿共」的卡車，十分之九也來自美國。宋慶齡心裡明白，這些「援助」的取得是與她的手足同胞——國民黨中的親美派宋子文、宋美齡以及宋藹齡等人的活動有關的。

一九三三年夏天，正當宋慶齡在為保障民權，營救革命政治犯，支援蘇區共產黨，與國民黨法西斯政權搏鬥的時候，財政部長宋子文卻到歐美遊說，為國民政府爭取巨額援助。五月十六日，他從倫敦向美國廣播電臺聽眾發表的一次講演中，竟然把自己和他的姐妹宋慶齡等都受過美國的高等教育來討好美國資本案，乞求他們的援助。他說：「你們知道我國政府本屆內閣成員中有一半以上是你們的高等院校畢業生嗎？我很幸運，是哈佛大學畢業生。在我的近親裡，我的妹妹蔣介石夫人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生。兩個姐姐孫中山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她的丈夫是實業部長）都曾經在喬治亞州梅肯的衛斯理安女子學校讀過書。」<sup>271</sup>

八月，當宋子文從華盛頓回國時，確實得到了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美國老闊們所如如此「慷慨」，一方面是為加強對國民黨政府的控制和幫助其「剿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抗日本獨霸中國而損害他們的在華利益。據美國軍需品調查委員會主席供稱：蔣介石「將此款全部用於購買軍火與飛機」。

宋慶齡針鋒相對，向美國人民發起了一個反對美國干涉中國的運動，她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發表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呼籲制止美國政府的罪惡政策，否則，受害的不止是中國人民。她說：「我熱切地呼籲你們發動一場強有力的運動，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她譴責「美帝國主義提供軍火、飛機、炸彈、飛行員並貸款給腐敗的南京政府，暴露了它同南京政府正在緊密勾結，屠殺數以百萬計的工農群眾，進一步挑起並延長中國內部的混亂，造成更大的破壞」；並進一步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得到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援助，瓜分中國的陰影」正在威脅著我們，這將導致世界的大災難」。<sup>272</sup>

從此，美國經常聽到來自中國宋家姐妹兄弟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代表國民黨腐敗政府、蔣介石獨裁政權，一種代表中國人民；前者主要是對掌握美國政權的華爾街老闆們說的，後者則主要是對美國人民說的。營壘對立，涇渭分明。美國人民始終積極回應宋慶齡的呼籲，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而華爾街的老闆們則要看行情是否有利於他們對中國進一步的控制和掠奪。

世界人民支持中國人民的鬥爭，中國人民也支持世界人民的鬥爭，這在宋慶齡的一生奮鬥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宋慶齡以巨大的熱忱和精力，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幾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進

272 轉引自斯特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載《斯特朗在中國》第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二頁，三聯書店一九八五年版。

行了營救牛蘭夫婦的工作，這是她國際主義精神的一次突出表現。

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保障民權為宗旨，是不分國際畛域的，所以在反對中國白色恐怖，營救中國革命政治犯的同時，也與世界進步力量聯合在一起，積極參與國際上保障人權，營救被害者的活動。

一九三三年一月，當「民保盟」剛剛成立、開始與蔣介石法西斯政權鬥爭時，希特勒也在德國上臺，用異常殘酷和極端狂暴的法西斯獨裁，把德國人民推入中世紀式黑暗的深淵，不到半年時間，就逮捕了三四萬人與數千名工人階級的領袖和知識分子。這些眾多的被捕者受盡酷刑，有的被挖掉眼睛、敲掉牙齒、拔光頭髮、燒毀肢體、擊碎頭顱。在集中營裡，人們在手槍的逼迫下，在死亡的威脅下，被迫互相鞭撻以至雙方都失去知覺。至於法西斯政府和納粹黨有計劃地組織並鼓動起來對猶太人的迫害及反猶暴行，更是觸目驚心。

兩年前，宋慶齡曾多次逗留並留下美好印象的柏林及它風景如畫的郊區，如今已成為人間地獄。在郊區的森林裡每天早晨可以看見許多被拋在那裡的被害者的屍體。

不僅如此，與宋慶齡、魯迅等有戰鬥情誼和友好交往的德國偉大的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如愛因斯坦、托瑪斯·曼、凱斯·珂勒惠支和馬克思·利貝曼等，也全都受到迫害，有的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有的被放逐國外。《世界論壇報》的著名主筆奧西茨基博士，被暴徒用槍托敲掉了牙齒；小說家漢斯·鮑爾的手稿，被法西斯分子撕碎，又逼迫他吞食。五月十日，柏林大學附近一個廣場上，法西斯分子燃起熊熊大火，兩萬多冊珍貴書籍在烈焰中化為

灰燼——所有德國進步的學術與文化全被摧毀。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希特勒在德國的暴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卻博得中國反動派的喝彩。他們稱希特勒是「民族英雄」，說他「大刀闊斧」，並極力仿效。蔣介石派遣大批黨徒、特務到德國接受「蓋世太保」的訓練；希特勒也派遣大批軍事顧問到中國，幫助國民黨反動政府訓練軍官，策劃「剿共」，並提供大批借款和殺人武器，助桀為虐，殺害中國人民。蔣介石向蘇區紅軍發動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就是採取了德國顧問的「堡壘戰術」。

宋慶齡與「民保盟」同人從中外報紙上看到上述德國法西斯的暴行後，無比憤怒。他們多次議論，決定對德國政府提出抗議，聲援德國人民反對法西斯暴政的鬥爭，這對中國蔣介石法西斯政權也是一種打擊，可以收到「一箭雙雕」的效果。

為此，宋慶齡代表民權保障同盟起草了抗議書——就是後來收錄在《宋慶齡選集》裡的《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太人民的迫害》<sup>273</sup>一文。

抗議書以大量無可抵賴的事實，控訴了德國法西斯種種令人髮指的罪行，表示：「本同盟認為此種慘無人道之行為，不但蹂躪人權，且壓迫無辜學者作家，不啻自摧殘德國文化。茲為人道起見，為社會文化之進步起見，特提出最嚴重之抗議。」

魯迅則撰寫出《華德保粹優劣論》《華德焚書異同論》等雜文，直接對中外法西斯一併進

273 該文摘登在當年的《申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時，內容相同，只是字句略有差異。

行抨擊。

同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魯迅、林語堂、史沫特萊、伊羅生一起，到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遞交了抗議書，由該領事館副領事貝連接見，表示將代轉達該國駐華大使。宋慶齡還將她寫的抗議聲明向國外進步報刊投寄。可是，德國大使陶德曼卻把抗議書直接寄還宋慶齡，拒絕轉給希特勒政府，暴露了他們色厲內荏的本質。然而，他們的蠻橫態度，未能削弱宋慶齡等這一舉世矚目的抗議行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繼《申報》在五月十四日報導了這一抗議行動後，五月二十九日《中國論壇》也作了報導。楊杏佛曾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說：「民權保障同盟抗議之目的，乃在喚起世界人士為正義而奮鬥。德使因地位關係，不允將抗議書轉致該國政府，實為當然之事。然同盟會此策已引起舉世特殊之注意，可謂已達到相當目的。」六月二十三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在刊登這一消息的同時，還發表了題為《德國法西斯蒂的骯髒的手》的評論。上海猶太人協會致函民權保障同盟表示感謝。日本文學界也對德國法西斯的焚書暴行提出了抗議。七月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互濟總會發表《為援助德國法西斯蒂恐怖下的革命戰士宣言》，號召工人、農民、勞苦群眾、革命學生結成最廣大的統一戰線，來援助德國革命戰士，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法西斯蒂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還成立了「反法西斯後援會」，各區成立了分會。上海恒豐廠、申新七廠、滬東三星廠的工人紛紛用通電、募捐等方式，給受希特勒黨徒迫害的德國人民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援助。上海滬東

區的工人還召開了「反法西斯蒂後援代表大會」，並向德國駐滬領事館拍發了抗議電。

更令人感動的是，宋慶齡的抗議聲明在德國本土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二年，宋慶齡率代表團到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當時許多外國代表懷著崇敬的心情請宋慶齡簽名。一位西德的年輕詩人貝格爾，寄了一張有宋慶齡簽名的照片給他媽媽。這位詩人向中國代表團成員朱子奇談到他的少年時代是在法西斯集中營裡同他媽媽一起度過的。他媽媽還珍藏著一張當年萊比錫的地下報紙，上面登有宋慶齡從中國上海寄出的譴責希特勒屠殺德國工人階級和進步人士的抗議聲明。作為一個詩人，他特別高興地注意到，在宋慶齡的抗議聲明中，特別怒斥了對當代偉大藝術家凱斯·珂勒惠支、馬克思·利貝曼、作曲家波盧諾·瓦爾特、小說家漢斯·鮑爾等人的殘酷迫害，要求立即釋放他們，恢復他們的人身自由和創作權利。他媽媽接到宋慶齡的照片十分激動，要他兒子代表她向宋慶齡深致敬意。<sup>274</sup>

德國法西斯對德國共產黨的鎮壓尤其殘酷。他們逮捕德共領袖台爾曼後，又大肆屠殺共產黨員，破壞共產黨的組織。一九三二年夏天宋慶齡母親病逝後陪宋回國的胡蘭畦，後來在宋慶齡的資助下，又返回德國，在德共中央做秘密交通工作。一九三三年春天，也被捕關進了女牢，國民黨政府駐德使館置之不理。宋慶齡得知後，立即與魯迅等人以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向德

274 參見朱子奇：《世界人民永遠感念您，讚頌您》，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國領事館提出嚴正抗議。三個月後，胡蘭畦終於獲釋，她對宋慶齡的營救十分感激。<sup>275</sup>

據馬海德回憶，宋慶齡還參與了國際上為監禁的政治犯辯護的活動。<sup>276</sup>這些活動是通過國際保護勞工組織和世界名人蕭伯納進行的。她為此與國外各方面人士廣泛地通信聯繫，並撰寫專文在國外發表，廣為宣傳。

## 二、同蕭伯納的戰友情誼

宋慶齡善於利用國際進步力量，打擊中國法西斯獨裁統治。這方面，她在接待大文豪蕭伯納的活動中顯示得尤為突出。

終宋慶齡的一生，與蕭伯納的直接接觸並不多，但他們的戰鬥友誼卻赫然載入了史冊。

一九三三年二月，蕭伯納作環球旅行到達上海，計畫只逗留一天。由於他與宋慶齡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譽主席，就由宋慶齡出面接待，民權保障同盟的主要負責人全都作陪。

蕭伯納是以諷刺與幽默見長的英國大文豪——作家兼戲劇家。他一方面以辛辣的諷刺指向英國紳士社會和一切罪惡勢力，另一方面又將同情的手伸向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為世界和平和進步事業奔走呼號。他這次雖是出來旅遊，但到處都令反動派心驚膽戰。英國政府對他提出了警告。宋慶齡熱情接待他，既是對他的進步活動表示支持，

<sup>275</sup> 參見《胡蘭畦回憶錄》第二百五十八、三百一十三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sup>276</sup> 參看馬海德：《偉大的形象，親切的友情》，載《中國建設》一九八一年八月。

為他的活動提供有利的舞臺，同時也是民權保障同盟對中國反動派的一次示威，還可以擴大同盟在國內外的影響。

蕭伯納沒有辜負宋慶齡等人的期望。他利用公開與各界人士及記者見面的機會，巧妙地宣傳了蘇聯，宣傳了社會主義，又揶揄了隱藏在人皮底下的魑魅魍魎，使那些丑類雖攻擊他「宣傳赤化」，又奈何他不得。

二月十七日晨五時，宋慶齡偕同楊杏佛等人一起赴碼頭，迎接蕭伯納。六時，白髮皓髯、精神矍鑠的蕭伯納偕其夫人乘坐的英國「皇后」號遠洋客輪抵達吳淞口。宋慶齡等上船歡迎，在船上和蕭伯納同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宋慶齡在上海莫里哀路住宅內宴請蕭伯納後留影。右起：魯迅、林語堂、伊羅生、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史沫特萊。

進早餐，然後由宋慶齡等陪同客人登岸。蕭伯納先赴外白渡理查飯店與來滬各旅遊團團員會面，然後赴中央研究院拜訪蔡元培，中午到宋慶齡寓所。宋慶齡用特備的素菜宴請他。蔡元培、楊杏佛、魯迅、林語堂、伊羅生、史沫特萊等作陪。

下午二時，蕭伯納參加由蔡元培任理事長的國際筆會中國分會在福開森路世界學院舉行的歡迎會。會上，筆會贈送給蕭伯納一盒泥製京劇臉譜。蕭伯納高興地接受了禮物，並感歎地說：京劇舞臺上老生、小生、花旦、戰士、惡魔的不同，都能從臉譜上進行鑒別；生活中人們的面貌大都相同，但內心卻未必相似。

下午三時，蕭伯納離開世界學院，返回宋慶齡的寓所，在宋宅後花園草地上接見中外記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像調侃又像諷刺地發表談話。在介紹社會主義的蘇聯取得的進步之後，他指出：「社會主義早晚必然要普遍實行於世界各國，雖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驟，在各個國家裡所採取的方式，也許互不相同，但是殊途同歸，到最後的終點，始終還是要走上同一條道路，而達到同一個水平線。」

談到中國問題時，蕭伯納說：「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眾應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王公。」談到中國文化時，蕭伯納說：「文化的意義，照科學的解釋，是人的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的行為。」他對中國反動政府摧殘文化、殘害進步知識分子政策進行冷嘲熱諷，指出：「在中國，除開農田裡還可以找著少許文化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文化可說的了。」

蕭伯納侃侃而談時，蔡元培、魯迅等人靜靜地站在草地一旁，很有興味地聽著。宋慶齡站在石階前，緊閉著將要笑出來的嘴唇，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情。<sup>277</sup>

招待會結束後，宋慶齡等人就前往碼頭給蕭伯納送行。

蕭伯納這次在上海雖然只停留一天，卻滿城傳遍他的「幽默」、「諷刺」、「名言」和「軼事」。各報作了各種各樣的報導和評論。這些文字又生動地反映出各種勢力和人物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魯迅離開宋慶齡寓所回家之後，立即與在他家避難的瞿秋白商量，決定把報刊上對蕭伯納或捧或罵、或冷或熱的文章剪輯下來，編為《蕭伯納在上海》一書，交由上海野草書屋印刷發行。它確實像一面鏡子，映出了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色各樣的相貌。

宋慶齡的高風亮節和堅定的革命立場，使她在幾十年的艱苦鬥爭中，得到了一批又一批國內和國際真誠的朋友，其中大多數是肝膽相照的有識之士。就國際友人而言，大革命時期，宋慶齡結識了鮑羅廷夫婦、斯特朗、普羅梅等人。之後，她流亡國外，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的活動，又結識了高爾基、蔡特金、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巴比塞、蕭伯納等一些為世界和平和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國際著名人士。回國後，又結識更多的在華工作的國際主義戰士。在為保障民權和中國革命的鬥爭中，她得到這些朋友熱情而有力的幫助；她也幫助這些朋友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民，瞭解中國革命，使他們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進步事業做出卓

越的貢獻，成為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

宋慶齡的國際主義精神，突出地表現在她與這些在華國際朋友的交往上。

### 三、長期任秘書的史沫特萊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較早結識宋慶齡的國際友人是史沫特萊女士。

史沫特萊一八九二年生於美國西部密蘇里州一個貧苦農民家裡，比宋慶齡大一歲。由於她父親有一半印第安人的血統，種族歧視在她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第一道傷痕。後來，她隨父母移居到柯洛拉州煤礦區。為了生活，年幼時她曾當過報童，後來由親友資助，才有機會在一家慈善機構主辦的學校免費讀書。但她連小學也沒有讀完，以後主要靠自學，半工半讀，先後當過侍女、煙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等。由於她勤奮好學，在青年時代就顯露出寫作才能。她經常接觸處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對他們有深厚的階級感情，因此她立場堅定，愛恨分明，敢於向反動勢力挑戰，加以她有豐富的生活實踐，所以寫出了不少揭露黑暗社會、同情勞動人民的好作品，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歡迎和讚譽。

史沫特萊具有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早就關注著中國。她深深地為中國古老的文化、人民的苦難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吸引，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暑期學校裡寫出第一篇關於亞洲的論文，論述當白種人還處於野蠻人之時，中國人對世界文明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一九二八年以後，她終於如願以償，先後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同

時也是共產國際秘密黨員)的身分，長期在中國深入生活，進行採訪和報導。

一九三一年七月，宋慶齡從歐洲回國後，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結交的外國朋友中，首先結識的就是史沫特萊。當時擔任宋慶齡秘書的胡蘭畦回憶說：那時，我住在莫里哀路（今上海香山路）宋宅，宋慶齡住在孔家時候多，因此我幾乎每天都要把收到的信件親送給她，有時也按她的意思代為接待一些客人。有一天，我給送的信中有一封英文信，她看過後把信拿在手上揚了揚說：「這封信的英文寫得好，這信的英文基礎很高深，話沒有多少句，語言和用字都是很美的。」原來這封信是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滬記者史沫特萊寫的，大意是為援救一個人的生命，要求宋在百忙中給予五分鐘談話。宋慶齡立即覆信，約在寓所接見史沫特萊。她要營救的人就是共產國際駐上海情報站負責人牛蘭。<sup>278</sup>

在這之前，史沫特萊已經結識魯迅。在長期的交往和革命鬥爭中，她像魯迅、宋慶齡一樣，熱愛人民，憎恨暴虐；主持正義，斥責邪惡。共同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感情，使他們很快成為莫逆之交。由於史沫特萊在上海的外國人中交際甚廣，後來就由她介紹，宋慶齡得以結識許多很好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馬海德等等。

在民權保障同盟時期，史沫特萊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與林語堂、伊羅生一起負責用英文發佈出版物和通信。她以火一樣的熱情忘我地工作，每當得到一個從江西、從蘇區來的

消息，或城市裡的工人鬥爭、農村裡的農民鬥爭等情況時，就高興得不能睡覺，常常深夜還到郵局去取信或者發稿。同時，那些捕捉革命者、槍殺革命者等黑暗血腥的消息，也常常使她苦惱，損害她的健康。但史沫特萊不管怎樣被巡捕房所注意，也仍然勇敢地向外國發稿，宣傳中國工農紅軍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sup>279</sup>

與宋慶齡一樣，史沫特萊不顧反動派強加她的「通匪」、「蘇聯間諜」等種種罪名，運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幫助「民保盟」同共產國際和蘇聯有關方面建立聯繫，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楊杏佛遭殺害，「民保盟」被迫停止活動之後，史沫特萊仍然以做宋慶齡的秘書為榮，並主動承擔起更危險的工作——保衛宋慶齡。國民黨特務殺害楊杏佛之後，蔣介石最感興趣的是，看是否達到威嚇宋慶齡的目的。當得知宋慶齡毫不屈服時，他氣急敗壞地要戴笠對宋慶齡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於是，沈醉根據戴笠的指示，策劃對宋慶齡新的進攻。

起初，戴笠提出「一定要設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的方案」。於是，沈醉便派了一名女特務，假扮成宋宅附近一家住戶的女傭人，去和宋家的李媽（李燕娥）拉關係。由於這個女特務急於打聽宋慶齡的情況，引起李媽的懷疑，沒有幾天就不再理睬這個女特務了，使她一無所獲。隨後，沈醉又利用李媽新近與其流氓丈夫離婚的線索，另派一個男特務去勾引李媽，可是很快又被識破了。

279 參見丁玲：《噩耗傳來》，載《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特務們的各種花招連連失敗後，蔣介石命令他們長期監視宋慶齡，並每週寫出監視報告送南京。於是，兩個特務分上下午輪流守候在宋慶齡寓所附近，專門注意出入宋宅的人員，有些乘汽車來的人便將車號抄下來，認識的人便記下姓名，並記錄進出時間。

與此同時，在戴笠的催促下，沈醉又策劃出迫害宋慶齡的一個新陰謀：用汽車去撞宋慶齡所乘坐的汽車，企圖將她撞成重傷，使她不能再四處活動。沈醉認為這事應當在租界內的馬路上搞。具體做法是把特務乘坐汽車前面的擋風玻璃換成不易破裂的保險玻璃，駕車的特務還穿上防彈護胸。等宋慶齡乘車外出時尾隨後面，遇到馬路上亮紅燈時宋慶齡的汽車停下，特務的車便朝宋慶齡車的尾部猛撞……戴笠認為這個辦法很好，可是叫誰去執行呢？沈醉自告奮勇由他執行。他對戴笠說：「我的駕駛技術較好，而且決不會洩漏出去，這是最穩妥可靠的了。」戴笠同意這個意見，於是沈醉就去準備，反覆琢磨怎樣在撞車中使自己的頭部、胸部等處避免受到重傷。不久，戴笠自南京到上海，沈醉問及此事時，他苦笑了一下，說蔣介石雖認為這個辦法很好，可是顧慮如果把宋慶齡撞死或傷勢過重，宋美齡和宋子文會吵鬧的。所以戴笠叫沈醉「還是要做好準備，在沒有他的命令之前決不准輕易去做」。<sup>280</sup>

很清楚，要不是蔣介石顧忌宋慶齡的威望以及宋子文、宋美齡出於同胞情誼的保護，宋慶齡早就遭到毒手了。但即使這樣，特務對她的威脅始終沒有解除。寫匿名信或打電話恐嚇

等，則一直沒有停止過。

宋慶齡處在如此種種魔影籠罩下，史沫特萊和其他一些友人決心暗中保護她的安全。史沫特萊的身上經常帶著一支防衛用的手槍。一位中共地下黨人回憶一九三四年夏史沫特萊與自己的一次談話說：「國民黨特務監視和包圍著宋慶齡（她稱之為孫夫人），她和別的同志在暗中保護著宋。她對我出示了她帶的手槍。她義形於色地說，如果萬一遇到特務圍捕的情況，她是要拼死抵抗的。」<sup>281</sup>

參加民權保障同盟的緊張而且繁重的戰鬥，極大地消耗了史沫特萊的精力，以致把身體弄垮了，不得不去蘇聯療養近一年時間。一九三七年初，她到達延安，後轉移到山西五臺山的八路軍總部，與朱德相處過一段時間。她對朱德十分崇敬，曾以巨大的精力為朱德撰寫傳記——《偉大的道路》。之後，由於遭到美國反動的麥卡錫主義者的迫害，她在一九四九年秋離開美國，寄居英國倫敦一位朋友家裡。翌年五月六日在貧病交迫中去世。史沫特萊始終熱愛中國，視中國為第二故鄉，在她的《遺囑》中說：「我特別要求將我的遺體火化，把骨灰運交朱德將軍。請把它埋葬在中國的土壤上。」<sup>282</sup>

281 馬汝鄰：《和斯諾相處的日子》，載《新聞研究資料》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馬汝鄰是當時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史沫特萊與他很熟。  
282 史沫特萊給瑪格麗特的信（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載《光明日報》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 四、斯諾的引路人

宋慶齡與埃德加·斯諾的交往，是中美人民友誼史上最生動的一章。斯諾是當代世界的傑出人物。在追溯他成功的足跡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宋慶齡。在宋慶齡所有外國朋友中，斯諾受她的影響最深，獲得的成就也最大。他們的友誼，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勝利，對中美關係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斯諾一九〇五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坎薩斯城。一九二八年秋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在上海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任助理編輯、代理主編等職，兼任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一九三一年九月，他應《先驅論壇報》主編威廉·布朗·梅洛尼之約，準備撰寫宋慶齡的傳略，為此請求會晤宋慶齡。經宋慶齡同意會見，並約定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作為會面地點。他們一起吃過午餐後繼續留下來喝茶。到了吃晚餐的時候，斯諾就認為他「已開始對宋慶齡有所瞭解了」。<sup>283</sup>幾天以後，他第一次專程到法租界莫里哀路那幢樸素的兩層樓房拜訪宋慶齡。

相識之後，斯諾對宋慶齡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認為她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她並無令人生畏之處。她為人謙虛，不愛出風頭。她需要有巨大的毅力和勇氣，才能頂住各種迫使她放棄原來的信念的壓力，擔負起歷史賦予她的使命。她並不是那種自命

不凡的人，同真誠的人交往，她顯得平易近人，但是，對於偽君子，她卻是針鋒相對的。」<sup>284</sup>

通過宋慶齡的啟迪，斯諾對中國的認識，以及他的整個世界觀，開始了一個根本的轉變。

原來，他是一個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理論，對中國共產黨有誤解，對蔣介石政權抱有幻想，以為是蔣介石把中國從「暴民」統治下拯救出來，「正義」在國民黨方面。他對晏陽初提倡的農村復興運動很感興趣，認為這是中國的出路。通過宋慶齡的教育和幫助，和對宋慶齡、魯迅等人的瞭解以及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觀察思考，再加上實地考察當時被蔣介石封鎖的神秘的陝北蘇區，他終於改變了原來的糊塗思想，從而奠定了他通向光輝頂點的基礎。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的第一塊基石，是來自宋慶齡。正如斯諾自述的：「宋慶齡通過言傳身帶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無知。」通過宋慶齡，他瞭解到國民黨及其領導層的內幕，從而疑惑大解，他說：「宋慶齡說明我認識了國民黨的情況。瞭解了孫中山的為人及其未竟的抱負。她還說明我瞭解她的家族情況，瞭解她為什麼拒絕與宋氏家族一起和蔣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他許多我從書本上無法瞭解到的事實。」

另一方面，正如斯諾前妻海倫所指出的，「使斯諾向左轉的主要影響來自孫夫人自己的榜樣」；<sup>285</sup>「使斯諾感動的不是她的言詞，而是她的行為」。<sup>286</sup>惠勒·斯諾也說：「斯諾對這位

284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九十六、九十七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285 引自張彥：《美國朋友懷念著宋慶齡》，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286 引自蕭乾：《海倫·斯諾如是說》，載《花城》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英勇的婦女極為欽佩，她不惜犧牲家庭關係和財富置身於革命一邊。」<sup>287</sup>正是由於宋慶齡和魯迅等先鋒戰士們蔑視國民黨反動派殘暴迫害而堅持戰鬥、巍然挺立的榜樣，強烈地感染了斯諾，使他轉變了思想，增強了戰鬥的勇氣，進而看到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

斯諾說：「通過她，我體驗到了中國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虧早結識了宋慶齡，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並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國提高到憑其歷史和眾多人口在世界上應佔有的地位。」<sup>288</sup>同時，他還認清國民黨政府是一個腐敗、缺乏效率和獨裁的政府，是中國一切苦難的根源，中國非但不能靠蔣介石這個獨裁者拯救，相反，必須切除這個毒瘤。中國需要有一場血與火的暴力革命。他雖是美國人，卻不願意當一個旁觀者，而要積極地投入到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中來，後來他還與宋慶齡等合作，搞起了工業合作社運動。他說：「我和她一起把數以千計的難民組織起來，成立了合作社，收養戰爭和饑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兒，開辦醫院，協助年青人學會用有效的新方法為古老的祖國服務。」

宋慶齡得到斯諾的無限信賴，一九三二年底，當斯諾決定與海倫結婚時，便最先向宋慶齡等朋友報喜。宋慶齡高興地為他們舉辦了豪華的廣東式宴會，並贈送給他們一把美國造的銀質咖啡電濾壺。

<sup>287</sup> 惠勒：《「我熱愛中國」》第一百〇七頁，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版。

<sup>288</sup>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九十八、九十九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為了感謝宋慶齡的教育和幫助，斯諾把自己嘔心瀝血花費五年時間編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集《活的中國》一書，獻給宋慶齡，以紀念這一段友誼。這部集子，收集魯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蕭軍、郭沫若等十餘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命作家和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而該書的編輯思想，則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期宋慶齡和魯迅對斯諾思想的教育和影響。斯諾指出，編輯該書的目的，是為著尋求「正在改造著中國人民思想的那種精神、物質和文化的力量」<sup>289</sup>。在這些作品中，他不但「看到了一個被鞭笞著的民族的傷痕血跡，還看到這個民族倔強高貴的靈魂」<sup>290</sup>。

《活的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在英國倫敦出版時，斯諾在卷首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獻詞：

獻給 S · C · L · (宋慶齡)，

她的堅貞不屈，勇敢忠誠和她的精神的美，

是活的中國最卓越而輝煌的象徵。

宋慶齡不僅從思想上促使斯諾進步，而且幫助他進入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蘇區訪問，從而為他打開了通向光輝頂點的第一扇大門。

289 (美)埃德加·斯諾：《活的中國》序言，英國一九三六年版。

290 蕭乾：《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載《新文學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斯諾的思想轉變之後，就認識到中國真正的希望在中國共產黨一邊，於是渴望親身到陝北看看。一九三六年春，已在北平安家的斯諾專程到上海拜會宋慶齡，表明自己的迫切心情。斯諾說：「我請她幫助我，以便紅軍起碼把我作為一個中立者來接待，而不把我當作間諜。」<sup>291</sup>

宋慶齡滿口答應了斯諾的請求。不久，她接到中共中央電報，「邀請一位元公道的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陝北去實地考察邊區的情況，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sup>292</sup>於是宋慶齡推薦了她最信賴的斯諾和馬海德大夫前去陝北。真是慧眼識英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確是最優秀的人才，對於共產黨來說，沒有再比他倆更合心意的應邀者了。

去陝北對斯諾的確是一次生死攸關的冒險行動。當他熱切盼望的機會到來時，他反而有些疑慮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心理也並不奇怪。當時，工農紅軍雖然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協定，並有一些來往，但白色恐怖依然籠罩著西安。馬海德先前已經去過，但是沒能通過西安。這一次是否還會發生同樣情況呢？而且西安到保安（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去的路，是一條既漫長又危險的道路，常有大批土匪出沒……然而，又是一「宋慶齡打消了他的疑慮，使他知道這次旅行對於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為之犧牲的事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sup>293</sup>

291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一百八十二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292 宋慶齡對馬海德說的話，引自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293 路易·艾黎：《對埃德加·斯諾的回憶片斷》，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宋慶齡為保證他們兩人順利進入陝北，已作了精心安排。她特地委託剛到陝北黨中央送信回來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董健吾擔任護送斯諾和馬海德去蘇區的任務。

臨行前，宋慶齡與董健吾具體商定了他們三人在西安接頭的時間、地點、方法。然後，宋慶齡給斯諾和馬海德作了安排，給了他們半張五英鎊鈔票，作為與董健吾的「接頭信」。

中共中央充分信任宋慶齡的舉薦，對斯諾完全開放。周恩來對斯諾說：「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導。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導，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sup>294</sup>

這使斯諾深為感動。

斯諾在陝北作了三個多月的參觀訪問，然後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寫出了震驚世界的巨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

這本書，猶如利沙加勒受馬克思贊助寫出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和列寧高度評價的約翰·里德採訪俄國十月革命後寫的《震撼世界的十日》，被人們讚譽為國際報告文學史上又一座巍峨屹立的豐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部壯麗的史詩。它「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sup>295</sup>

<sup>294</sup>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四十二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sup>295</sup> 拉鐵摩爾：《中國震撼世界》序，北京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紅星照耀中國》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在英國出版，幾個星期內就銷售了十萬冊以上。從那時以來，半個世紀中一直被列為世界暢銷書前列，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出版，馳譽全球，長盛不衰。

斯諾由此一舉成名，被稱為「西方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威」。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瑪律科姆·考利，稱讚斯諾「建立了本世紀一位元記者單獨做到的最偉大的功勳」。<sup>296</sup>

《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是因為中國的紅軍及其根據地從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末期誕生時起，一直處於國民黨反動派軍事圍剿、政治封鎖，以及他們的一切宣傳機器所散佈的謠言誣衊之中。正如斯諾所說的，「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



一九三九年，宋慶齡在香港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296 (美)肯尼士·休梅克：《斯諾——粉碎「赤匪神話」的美國記者》。轉自劉力群主編：《紀念埃德加·斯諾》第三百八十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sup>297</sup>海倫也指出：「在斯諾的報導發出之前，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他們的領袖毛澤東，不僅蘇聯人根本不瞭解，就連中國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說西方了。」所以海倫稱該書「代表了當時整個世界所需要的那種資訊」；這本書一經問世，就使「所有關於中國革命的無稽之談統統煙消雲散」。<sup>298</sup>

飲水思源，斯諾在《復始之旅》中寫到這次西行取得的巨大成功時說，此行是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一生，但「如果我不是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而是剛剛由我的祖國來到中國而訪問紅區，則我的感受也許就會打折扣。不但如此，反倒可能認為共產黨人是美國原則的敵對者」。如果這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而這西行之前「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就是指在國統區所受到的教育。這些教育中，如前述斯諾自己所強調的，宋慶齡給予的最大、最具有決定性。這說明，如果沒有這一段教育和思想的轉變，斯諾即使有陝北之行，也會是深入寶山，空手而歸。斯諾陝北之行的成功，當然主要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再加上斯諾自己的努力。但是，唯物主義者並不否認機遇與條件的重要作用。如果沒有宋慶齡的教育和幫助，那麼，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的。

一九四一年，斯諾因在宋慶齡支援下報導了皖南事變的真相，引起蔣介石的痛恨，加上《西行漫記》的積怨，就悍然取消了斯諾在中國當記者的權利，他被迫離開中國。臨行前，宋

297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一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298 《紅色中國內幕》再版序，第十五、十六頁，紐約一九七九年版。

慶齡對他說：「你以後回來吧。你屬於中國。」 299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政府一度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在國內則推行反動的麥卡錫主義，對主張與中國友好及在歷史上幫助過中國人民的美國人士，以莫須有的罪名，瘋狂地進行迫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諾曾因為中美友好做過重要工作而受到過羅斯福總統的讚譽，但這時卻因同樣原因，被聯邦調查局誣為「危險分子」，並被迫在一九五九年全家遷居瑞士。然而他在瑞士仍無自由，曾多次要求重訪第二故鄉中國，都遭到美國國務院的無理阻撓。一九六〇年，他在美國《展望》雜誌出版社加德納·考爾斯的幫助下，終於獲准以作家身分「合法」地來華採訪，為寫一本關於新中國的書收集材料。

如一九三六年一樣，新中國熱烈歡迎他。對他開放許多當時「不准外國人參觀」的地方。他的足跡遍及華北、西北、西南、內蒙古和西藏等地，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所以，他又成了「第一個」闖入「竹幕」觀察真實的紅色中國的美國記者。

斯諾多麼殷切地希望會見曾幫助他走向光輝頂點的引路人宋慶齡。可是不湊巧這時宋慶齡正在病中，醫生不准她會見任何客人。斯諾在這年十一月十日離華前夕，只得寫信給宋慶齡表示惋惜之情。

宋慶齡接信後十分激動，立即在病床上給斯諾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長信。

她首先表示也渴望二人會見，然而「疾病一直困擾著我，這是在我們尖銳的革命鬥爭中所經受的長期緊張生活的遺痕……它使我們現在不能交談，以回憶過去與瞻望未來。我感到非常遺憾」。

她深切地同情斯諾困難的處境，但是她瞭解斯諾，懂得怎樣去幫助他。與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一樣，他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鼓勵；鼓勵他為了真理而勇往直前、奮不顧身地去戰鬥。為此，她現身說法地講述自己的感受，認為雖然過去長期緊張的生活和尖銳革命鬥爭留給她嚴重的疾病「遺痕」，「但是假如一切事情要再重複一次的話，我還是願意同樣地生活。因為落後的事物與意識並不會自行消失的，而必須要通過這樣的尖銳鬥爭才能清除。」

要知道，這時宋慶齡已是六十七歲高齡的老人，而且又重病纏身，但這些話卻仍使人感觸到她胸中那顆像年輕人一樣勃勃跳動著的雄心，和她渾身像火一樣燃燒著的對人類正義事業的熾熱的情感。真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信中接著鼓勵斯諾以魯迅為榜樣，以「嚴格的觀察和分析」、「為真理奮鬥的勇氣」，去克服在向西方、特別是向美國公眾介紹新中國進步事業時遇到的困難和壓力。

信的最後，宋慶齡用滿腔的政治熱情和她對斯諾特殊親昵的筆觸寫道：

無論如何，希望你的新書獲得成功，寫未來的遠景也寫目前的。生命是短促的，而歷史是悠久的，歷史肯定是沿著一個方向——向著人民為和平與社會主義鬥爭的最後勝利的

道路前進的，讓人們說埃德加·斯諾曾幫助人民尋找這條道路。

祝你和你的家人健康。

你的誠摯的

宋慶齡  
300

值得慶幸的是，此後，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〇年，斯諾又兩次來華，並且終於與宋慶齡歡聚。一九七〇年除夕，宋慶齡還與斯諾夫婦一起吃火鍋，共敘中美友誼的往事。

斯諾從宋慶齡的教誨和友愛中受到巨大鼓舞，回去後日夜寫作，辛勤耕耘，寫了許多介紹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報導，並且完成了《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紅色中國》）、《中國巨變》等著作，熱情謳歌了新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正是他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不朽著作中所預言和矚望的。這些著作實際是《紅星照耀中國》的續篇。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斯諾這些關於中國的巨著，也凝聚著宋慶齡對斯諾的無限希望和深情。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斯諾在瑞士逝世。宋慶齡從斯諾夫人洛伊斯及其子女的來電中得悉噩耗後，立即電唁斯諾夫人，指出「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人民的記憶中將永葆長青」。<sup>301</sup>  
這年六月，宋慶齡又發表《紀念埃德加·斯諾》的文章，表示對斯諾深切的懷念，指出：

300 《宋慶齡書信集》下冊，第五百九十三至五百九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301 《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

「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埃德加·諾這位致力於中美兩大國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動家。太平洋兩岸的子孫後代將會感謝他，因為他留下了供他們研究中國歷史的遺產。」<sup>302</sup>

按照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一半安葬在美國紐約州赫德森河畔，一半安葬在他的第二故鄉——中國北京西郊燕園（今北京大學校址）的未名湖畔。

## 五、並肩作戰的其他國際友人

同樣受到宋慶齡很大幫助，與宋慶齡友誼很深，並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服務時間最長的，要算新西蘭作家路易·艾黎和美國醫生馬海德了。

路易·艾黎早於一九二九年在南京孫中山遺體遷葬儀式上第一次見到宋慶齡時起，就對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憶：「當時我站在道邊，和上海的童子軍們在一起，看著她一步步登上陵墓高高的石階。隨著歲月的流逝，從我後來同她的交往中，我越來越感到，在她秀麗文雅的外表下，包容著一顆鋼鐵般堅強的心。她總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陣地，來幫助那些為她所堅信的一切而奮鬥的人們。」<sup>303</sup>

一九三三年，路易·艾黎因參加中國革命工作，由史沫特萊帶領到莫里哀路寓所正式結識了宋慶齡。馬海德則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史沫特萊家中秘密舉行慶祝十月革命的宴會

302 《中國建設》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303 「新西蘭」路易·艾黎：《一朵永不凋謝的花——回憶宋慶齡二三事》，載《工人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上認識宋慶齡的。他們一方面利用各自的職業條件，協助宋慶齡做了許多革命工作——特別是幫助共產黨和紅軍的工作。一方面接受宋慶齡對他們的幫助，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的說明，例如組織他們學習馬列主義，進行社會調查等。

馬海德出身於一個煉鋼工人的家庭，對工人的苦難是有親身感受的。在上海他開了個診所，決心盡全力去解除苦難人民的病痛。由於過去他很少接觸政治，對許多社會問題都不能從本質上去認識，於是他參加了一個學習小組。這個小組是在宋慶齡的關懷下，由上海的幾位元外國朋友組織起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理論水準。當時參加學習的還有路易·艾黎、西普、羅森堡、史沫特萊、威努斯。小組負責人是路易·艾黎和西普。在宋慶齡的安排下，他們閱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馬列著作。通過學習，他們開始懂得了貧富不均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制度，同時也初步學會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世界和認識世界。

為了幫助他們理解所學的馬列主義，宋慶齡又組織他們深入工廠進行社會調查，瞭解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況。路易·艾黎當時在租界工部局任職，在一家工廠當督察員。通過他的聯繫，馬海德以科學研究為名，先後到二三十個工廠調查工人的職業病和營養不良的狀況，寫出了《鎘中毒在電鍍工業裡的情況》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揭露了殘酷剝削童工和職業性中毒等嚴重社會問題。馬海德說：「通過調查訪問，看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對

我的思想震動很大，更加激起了我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決心。」<sup>304</sup>

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宋慶齡要進行支持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革命活動是十分困難和危險的。但是在路易·艾黎、馬海德等外國朋友的幫助下，她成功地做了許多工作。例如，她常把馬海德的診所安排給中共地下黨舉行秘密聯絡或開會的場所。馬海德說：「因為醫生的候診室有許多人進出並不足怪。我常常得到她的通知：『星期五下午一點到五點你不要去診所。』在這段時間裡，我不在那兒，他們就一一來到我的候診室，召開會議，以後又各自散去。」<sup>305</sup>當時紅軍根據地醫療條件十分困難，宋慶齡經常托馬海德買藥品和醫療器材支援紅軍。但是馬海德那個小小的診所裡只能零買一些，購買大批的藥品需要國民黨政府批准。宋慶齡就介紹馬海德找當時國聯的衛生顧問，請他幫忙批准，終於買到了許多藥品，然後由宋慶齡安排送往革命根據地。<sup>306</sup>

此外，馬海德和路易·艾黎還接受宋慶齡的委託，保護一些共產黨人離開上海。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宋慶齡本人也是在路易·艾黎的保護下離開日本兵佔領的上海。以後，路易·艾黎就辭去上海工部局的職務，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到武漢開展「工合運動」。馬海德則在一九三六年與斯諾一起去了陝北，直接為蘇區及新中國的醫療事業服務，後來還加入了中國

304 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305 馬海德：《偉大的形象，親切的友情》，載《中國建設》一九八一年八月。

306 參見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籍。他與宋慶齡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誼。宋慶齡把馬海德視為自家親人一般。有一次，她對馬海德說：「我是很關心你的，我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你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評你的。」馬海德說：「這種誠摯深厚的感情，使我無比激動。正是在宋慶齡同志近五十年來的培養和教育下，我才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出我的一點微薄力量。」<sup>307</sup>

在宋慶齡結交的國際友人中，伊羅生則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朋友。

伊羅生本名哈樂德·羅伯特·伊賽克(H. R. Isaacs)，一九一〇年出生於紐約的一個美籍猶太人家庭。一九三〇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兩家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和《大陸報》擔任記者、編輯。他曾深入川西採訪，看到那裡一片蕭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尤其在「九一八」之後，伊羅生目睹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入侵和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對中國人民的鬥爭深表同情，思想傾向於革命。之後，他接受共產國際委託，幫助中國共產黨工作，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創辦《中國論壇》，熱情介紹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在國際宣傳和支援中國革命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當一九三三年初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時，他才二十三歲。由於在此之前，他已由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了宋慶齡，於是他就成為同盟中央執委中唯一的一名外國人，又是最年輕的一個。他主編的《中國論壇》

307 參見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配合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發表同盟的檔和材料，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進行及時的揭露和有力的抨擊，發揮了類似於同盟機關報的戰鬥作用。宋慶齡還派自己的兩位秘書史沫特萊和陳翰笙幫助他工作。但是，《中國論壇》直接受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是中共在白區的一份週邊報紙。在當時，中共在白區的刊物不斷被摧毀的情況下，《中國論壇》存在的時間最長，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因此，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給它扣上「思想激烈，言論怪僻，對於黨國，每加攻擊」的罪名，並指控伊羅生「公然在論壇報中贊助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張推翻國民政府，鼓吹階級鬥爭」。但這份刊物卻憑藉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辦理的執照得以公開存在。民權保障同盟停止活動之後，它還繼續支持了半年之久。

由於民權保障同盟期間的共同戰鬥，伊羅生與宋慶齡、魯迅等人建立了友誼。尤其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工作中，他作為國際及中國兩個營救牛蘭委員會的成員，配合宋慶齡做了許多工作。此外，他還為美國一家出版社翻譯中國小說，靠魯迅、茅盾、丁玲等人幫助，選編一部名為《草鞋腳》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但是，遺憾的是，伊羅生後來不像他的美國同行斯諾那樣，在宋慶齡的幫助和中國革命烈火的薰陶下，堅持正確的道路前進，而是轉向了託派，與中共中央徹底決裂。

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為中國革命與宋慶齡並肩戰鬥的外國朋友除上述者外，還有一些，如參加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的美國人格蘭尼奇夫婦等。一九三五年格蘭尼奇夫婦來到上海，創辦宣傳中國抗戰的半月刊《中國呼聲》。這份雜誌成為當時上海少數幾位進步外國朋友與宋慶

齡、魯迅等團結的旗幟。宋慶齡曾給予鼓勵、指導和支持。中共地下黨也通過她在《中國呼聲》上發表文章，宣傳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魯迅和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進步人士也都為它撰寫文章，較早地揭露日本侵略東北、進攻上海的罪惡，喊出中國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的呼聲。馬海德既為這個刊物做翻譯工作，還寫抗日文章。在宋慶齡的關懷下，這份刊物在國際上起了很好的影響。<sup>308</sup>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領導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組織全國救國會七位元重要領導人被逮捕後，宋慶齡繼續領導救國會工作期間，格蘭尼奇曾給予她很大的幫助。

總之，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宋慶齡，不僅是中國革命者和愛國志士的保護人，也是世界各國革命友人到上海租界避難和進行活動的聯絡者。她為什麼會像磁鐵般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正如斯諾的前妻海倫·斯諾所說：「宋慶齡有許多條路可走，然而她選擇了一條最危險的、最困難、當時看來也是最無希望的道路。這使她對於年輕的西方人和中國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sup>309</sup>日本、美國、英國、德國、印度、越南等國的革命者，直接或間接地都同宋慶齡保持聯繫。宋慶齡則盡一切可能支援他們的工作，接濟他們的生活。在這方面，史沫特萊、魯迅和陳翰笙是她的得力助手。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之外，宋慶齡通過魯迅和內山完造的友誼，聯繫了一些日本朋友；幫助德國的一些進步朋友組成學習小組，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並

308 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309 引自張彥：《美國朋友懷念著宋慶齡》，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幫助他們進行反對法西斯運動。

宋慶齡團結國內外進步勢力，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艱苦搏鬥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而進行的戰略大轉移——長征及西北根據地的反「圍剿」，由於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央克服了王明「左」傾路線，確立了正確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再加上隨著國際上反對德、日、意法西斯鬥爭的進展，中國的政局也出現了轉機。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富有政治敏感和革命經驗的宋慶齡，緊跟時代潮流，推動歷史前進，她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開始譜寫新的篇章。

